

圖一 (漢)史游撰，(唐)顏師古注，(宋)畢應麟補註，《急就篇》，元後至元三年雙元路儒學刊玉海附刻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梁)周興嗣撰，《新板增廣附音釋文字字文註》，日本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從《千字文》到《識字卡》
中國識字教育發展極早，自有文字以來，便有了識字教學。清代著名語文教育學家王筠（一七八四—一八五四）在《教童子法》中提到：「蒙養之時，識字為先。」可見識字教學不但是語文教學的第一步，同時也是一切蒙養教育的起點。

中國古代識字教本品類繁多，如漢以前的《史籀篇》（周代）、《蒼頡》（秦代，傳李斯作）、《爰曆》（秦代，傳趙高作）、《博學》（秦代，傳胡毋敬作）等。有漢一代，雖

是以兒童蒙學識字教本——《千字文》出發點，探討院藏一件極具趣味性的識字教材——清末官修《識字卡》與《識字教授書》。

然曾經出現多種識字書，但就如同早期識字書一般，幾乎已經散失殆盡，完整地流傳下來的，僅史游（生卒

年不詳）《急就篇》（別稱《急就章》）一種。

《急就篇》總計二千一百四十四

引言
二〇〇九年七月一日至九月二十五日，本院書畫處於二〇四、二〇六、二〇八三間陳列室推出以《千字文》為書寫內容的「千字文書法展」，展出作品包括篆、隸、行、

草，或是混合體書蹟總四卷十二冊，除展品數量可觀之外，難得的是作者幾乎為歷代書法名家，如隋代智永，唐代懷素，宋代夢瑛、黃庭堅、宋高宗，元代趙孟頫、邊武、俞和，明代祝允明、文徵明、王寵、董其昌，以

及清代張照等，各家作品或「溫潤有勁」，或「圓厚蒼勁」，相當具有可看性。近日，彙集該展精華之《五體千字文選輯》一書即將出版，可說是「千字文書法展」的另一延續！本文不在討論《千字文》的書體之美，而

從《千字文》到《識字卡》——談一部清末官修幼童識字教材

教導學齡前幼童識字，自古以來都是家庭教育的一環，坊間形形色色，琳琅滿目的識字讀本與識字卡多至不勝枚舉。本文從《千字文》出發，介紹的是一百年前清朝學部編譯圖書局出版的官方《識字卡》及《識字教授書》。

盧雪燕



圖三 (梁)周興嗣撰，《千字文》，明內府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編成的《文字蒙求》，甚至是長期流傳於民間，但史書上著錄極少，統稱為《雜字》的識字教本等。這些識字



圖四 不著撰人，《新編對相四言》，明刊黑口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教材各有特色，也個別流行於不同時期，不同地區，適時扮演其童蒙識字教育的角色。

《識字卡》與《識字教授書》如前文所言，識字是一切蒙養教育的起點，三、百、千向為私塾



圖三 (梁)周興嗣撰，《千字文》，明內府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字，內容分類編排，有七字一句、三字一句，以及四字一句，按韻編排，很適合兒童誦讀，(註一)流傳至今已出現好多種版本，單單本院，就收有元後至元三年(一三三七)慶元路儒學刊玉海附刻本三部，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一部，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本二部，以及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刊玉海附刻本一部，總四種七部之多。(圖一)

《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簡稱「三、百、千」，是繼《急就篇》之後最通行的識字教本。《千字文》是南北朝梁武帝大同年間(五三二—五四三)，散騎侍郎周興嗣(生卒年不詳)編撰；(圖二、圖三)《百家姓》出現於宋初；《三字經》則是南宋學者王應麟(一一二—一一九六)所撰。這三種字書結構大致相同，《千字文》、《百家姓》四言一句，《三字經》三言一句，皆採韻語編排，押韻整齊，很適合兒童誦讀。

關於《千字文》的由來，唐人

李綽(生卒年不詳)《尚書故實》有一段有趣的記載。梁武帝為教諸子寫字，命殷鐵石(生卒年不詳)從王羲之的書法中拓出一千個不同的字，但又覺得這些字雜亂無章，故召來才思敏捷的周興嗣為之作韻，沒想到周興嗣一夜間就完成了，武帝大為激賞，而周興嗣卻也在一夜之間白了頭髮。

《百家姓》內容以中國古代的四百多個姓氏為主，宋本《百家姓》已不復存在，今日所見大都是清代增修的《增補百家姓》。至於《三字經》，它的內容簡樸易懂，韻腳既緊湊又富有變化，兒童更容易朗讀誦記，因此相當受到歡迎，它的影響層面很廣，雖然出現的時間較晚，但卻是最廣泛流行的識字教本，凡是上過私塾的，大概就讀過《三字經》。

除三、百、千之外，古代還流行過好幾種既通俗，又有趣的識字教本，比如說像是南宋末出現的圖、字對照本《對相四言》，以及後來衍生出來的《新編對相四言》，(圖四)或是王筠從許慎(約五八一—一四七)《說文解字》中選輯常用的兩千多字



圖七 學部編譯圖書局編，《識字教授書》上册，清宣統元年閏二月出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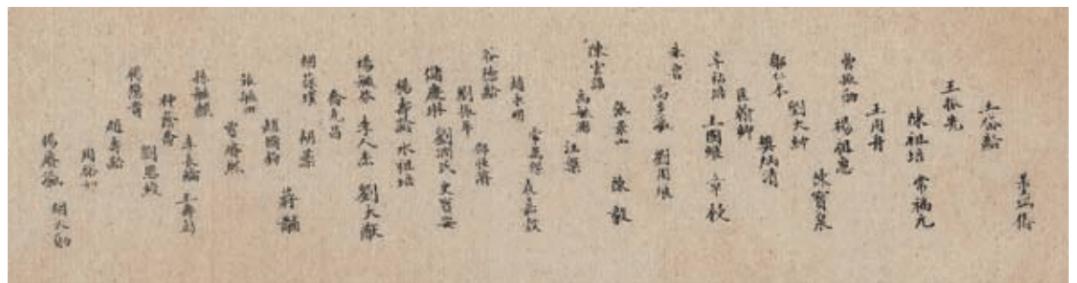


圖六 學部編譯圖書局編，蒙學《識字卡》與《識字教授書》，清宣統元年閏二月出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寫初學識字書》四十七包，（註二）以及劉用焯（字炳堂，順天永清人，官階鹽大使，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到局）的《識字圖》。另一類則是專供「簡易識字學塾」使用的。（註三）例如王用舟（字濟若，直隸定州人，舉人，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到局。）、高步瀛（字閔仙，順天霸州人，官階主事，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到局。）、曹振勛（字致堯，直隸安州人，官階附生，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到局）合著的《簡易識字課本》，以及樊炳清（字少泉，浙江山陰人，官階附生，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到局。）、常福元（字伯琦，江蘇江南人，官階州同，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到局。）、董瑞椿（字茂堂，江蘇吳縣人，官階小京官，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到局）各自編著的《簡易識字課本》等。

《識字卡》四十六包與《識字教授書》一冊，與鐵筆（一支）及練習書寫板（一片）合為一套，共同盛裝於長十五·八公分，寬十·七公分，高三·三分的鐵盒內。（圖六）

《識字教授書》，鉛字印刷，有



圖五 清光緒33年（1907）學部編譯圖書局全體職員照像，本圖選自學部編譯圖書局編，《第二次學部編譯圖書局備覽戊申正月始戊申十二月止》，光緒34年12月印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所用，然而當清末推行政改，近代學制興起，私塾逐漸為初等小學所取代時，傳統識字教材同樣面臨巨大的衝擊，取而代之便是各式各樣的教科書，本文介紹的《識字卡》與《識字教授書》就是清末出現的眾多新式識字教材的其中之一。

《識字卡》與《識字教授書》，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學部編譯圖書局（以下簡稱圖書局）編書課國文股職員張景山（字天作，直隸衡水人，官階縣丞，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到局）編，同年八月付印，宣統二年（一九一〇）閏二月出版。學部編譯圖書局隸屬學部，成立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六月，性質有點像是今天的國立編譯館，是官方編撰各級學堂教科書的專職機構。（圖五）

早在蒙學《識字卡》及《識字教授書》以前，學部編譯圖書局就已經編了好幾種識字讀本，一類是專為學齡前幼童所編的，例如王壽彭（一八七五—一九二九，清末狀元，山東濰縣人，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到局，任編書課經學修身股修撰。）的

框無欄，外觀尺寸高十五點四公分，廣十點五公分。「教授書」，意即「教師手冊」，專供教師授課使用，《識字教授書》就是《識字卡》的教師手冊。（圖七）該書凡例明白指出，由於識字是教科書使用的基礎，因此幼兒入學前若未習字，則較難適應國文科以外教科書，設若已經習字，但所學「既難周備，且難畫一，往往既入學堂，而書中生字，非平日所習，仍不免於困難。」可見性質與前述王壽彭編著識字教材等近似，是專為學齡前幼童所設計的，目的是為銜接初等小學堂的課程。

「識字卡」，厚紙裁切，每卡五公分見方，單列楷體大字，為避免紊亂，編者特別將二十卡合為一包，並注明包號於大字左下，總九百二十七字（最後一包二十七字）。（圖八）按張景山的構想，「識字卡」編著純粹為學童入學做準備，因此選字以學部第一次編纂《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第一冊及第二冊內容為主。（圖九）比對識字卡與前述兩冊國文教科書，除不見「狐」、「打」、



圖九 《第十九課 司馬光》 選自學部編譯圖書局編，《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 第二冊》，光緒34年正月修改再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識字卡》與主流傳統識字教材三、百、千

略之。此外，作者特別在文末加列「備考」，用來說明一字數音或一字數義的特殊狀況，例如第一包「耳」字，備考云：「耳，主聽者也，為名字，又助語辭。」第二包「衣」字，備考云：「衣，音依，名字也，又讀去聲，外動字也。」（圖十）

《識字卡》字數總量，基本上已經接近古代常用漢字的範圍，換言之，熟悉這些字以後，應該能達成編者設定的目標，即能閱讀非國文教科教材以外的教科書。從另一角度來看，《識字卡》雖然具有識字效率較高的優點，但不拘繁簡，純粹以解釋該字之難易為序的編排方式，難免造成學習上的困難。再者，摒棄傳統韻語誦唸的方法，也增添不少認字上的難度，雖然《識字教授書》載明各種教授方式，但成效如何，因資料匱乏，難以評估，加以少見流傳，推想該書出版後使用者可能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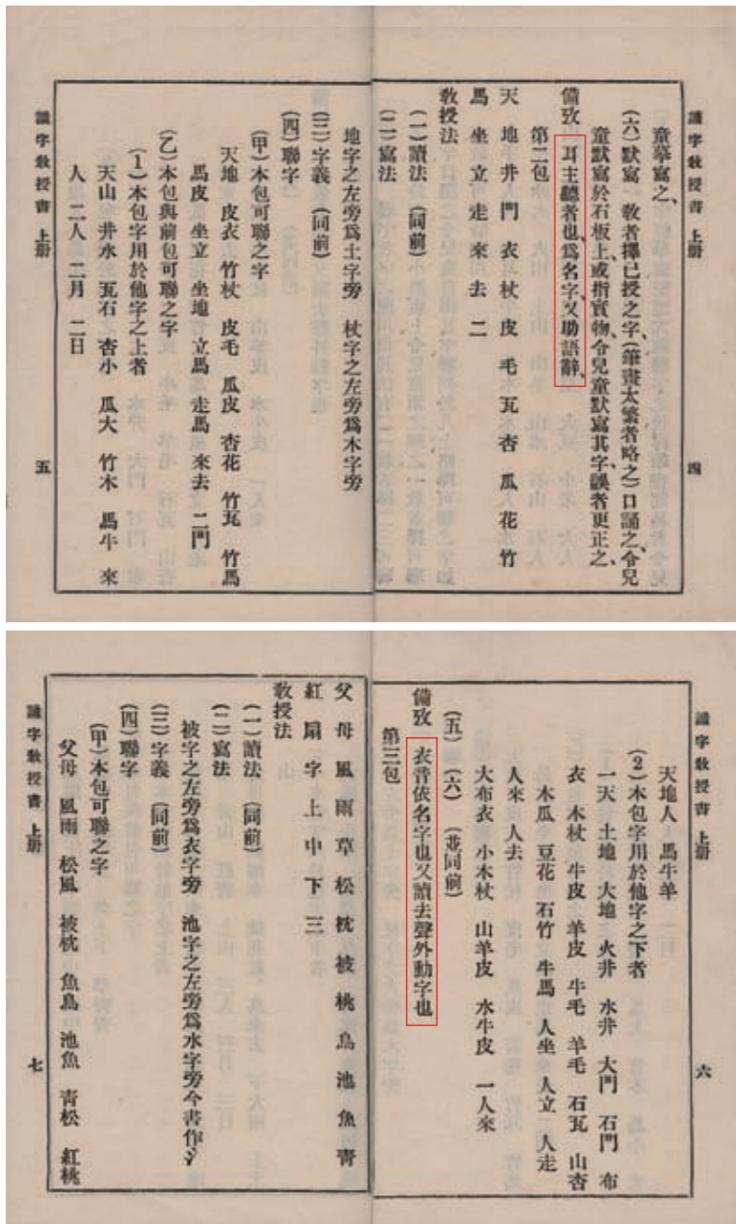
圖八 《識字卡》正面（單字）與背面（圖案） 學部編譯圖書局編，蒙學《識字卡》四十七包，清宣統元年閏二月出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閱讀與作文，三、百、千等傳統教材皆屬此類。據統計，古代漢字常用語約一千字左右，三、百、千總字數約二千字，習畢就已經具備相當的閱讀能力。至於「分散識字」，意即隨文識字或隨課文識字，其特色是「字不離詞、詞不離句、句不離文。」從課文中找出生字學習，在結合識字與閱讀的情況下，令學童不僅識字，還兼習書面用語，清末以來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多屬此類。不管是集中識字或分散識字，其優缺點互異，前者可快速累積識字能力，但閱讀或寫作能力學習則稍有延遲；後者識字效率較差，但識字與閱讀同時進行，可較早培養書面語閱讀能力。

「養」、「經」、「跌」、「法」、「謾」七字以外，其餘九百二十字皆包含其中，顯見果如編者所說的，識字卡純然是為初等小學課程作準備。只不過它的教學方式沿襲古代識字教育系統的「集中識字」（或稱紙上識

字）原則，與現代教科書「分散識字」（或稱書上識字）教學方式有所不同。「集中識字」是古代漢語教學的慣用方式，指的是以認識字形為優先，等到累積一定字數後，再練習

《識字教授書》不脫認字、摹寫、理解字義的基本原則，但強調讀音必須明確，書寫注重筆順，而字義解釋盡量淺近明顯，倘若筆畫過繁，則不必強行要求兒童摹寫。為加深印象，編者舉出「聯字」（即語詞）之例，教導兒童運用。每包教授完畢，由教者選擇已授之字口誦，令兒童默寫之，以加強記憶，當然筆畫過繁者



圖十 學部編譯圖書局編，《識字教授書》上冊，頁四一六，清宣統元年閏二月出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千百年而不衰，自然有其無法忽視的優點，如突顯漢字特色，選字規範具科學性、收字量適中，集中識字、教學效率高，或是教材按韻語編排、注重學以致用等，（註四）然而它畢竟屬於「文言識字教學體系」，內容既脫離兒童日常的生活經驗，用字遣詞也

不符合兒童初步的語言會話能力，因此遂有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的變革。如前文所敘，《識字卡》的學習目標是令兒童在上初等小學前即識字若干，好方便應付未來的課程需求，這樣的目的性和傳統的識字教育並無不同。

的學習。此外認字教授順序並不拘泥於包號，而是以各地風俗異同，並視幼童理解難易為準等原則，也與傳統教育方式有所不同。

以上大略是《識字卡》與三、百、千的差別，其實《識字卡》與三、百、千還是具有相同的特點，比如說九百二十七字，與《千字文》的一千字，《三字經》的一千零六十二字，差別不算太大，說明其沿襲古來兒童識字量的經驗總結。再者，《識字卡》的集中識字也是古代傳統的一部份，與之後新式教科書的分散識字方式也不同，關於此點，前文已多所敘述，不再贅言。

結語

清末新式學堂的興起帶動教科書的蓬勃發展，而由政府主導編撰教科書，更在學部編譯圖書局成立後真正落實，縱然官編教科書使用率遠遠不及民間出版，但仍能看出清政府為教科書所作的努力。在學部編譯圖書局所出版的各類教科書中，語文教科書的發行量最大，例如《初等小學國

文教科書》第一、二冊，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初版，三十三年六月再版，而三十四年正月再改修三版，幾乎每隔半年就重新出版，可見其銷售量必然相當可觀，使用的學堂可能也比較多。

院藏《識字卡》與《識字教授書》雖非正規的學堂用書，但廣義上也算是語文教科書的一種，其教導識字的本質與初等國文教科書並無不同，只是編排方式比較偏向傳統的集中識字，但教授方法卻做了些調整變革。

眾所周知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正是西學與中學，新學與舊學論戰激烈交鋒的時代，新式學堂與新式學科的建立，是西學漸漸凌駕中學的表徵，而傳統語文教學系統在歷經轉變變成屬於分散識字的國文教科書以後，實際上也面臨種種困難，例如學童因識字不多，無法立即使用其他科別教科書，或是識字速度過慢等問題，於是激發蒙學《識字卡》的編印。

嚴格說來，三、百、千等雖是古人用來教導學童識字的基本教材，但它的內容實則包含思想、教化、常識等多種層面，與《識字卡》單純的識字功能還是有所不同的。在諸多傳統識字教材中，與《識字卡》較類似的無非是圖文對照的《對相四言》（或是《新編對相四言》），或是王筠《文字蒙求》這類的書籍。背誦、講解、認字、習字向來是古代塾師教學的基本步驟，從《急救章》以降，識字教本多按韻語編排，不管是三字一句、四字一句、甚至是七字一句，大概都是為了這「背誦」二字，方便兒童背誦是何等重要！這也是三、百、千能風行千百年的最主要原因。

《識字卡》的編排方式已經完全悖離按韻編排的傳統方式，強調的是「字」本身，為利於辨識，將楷書字單獨寫在五公分見方紙上；為明字義，除教師講解外，特別在紙的背面加繪五色彩圖，至於「聯字」，就如今日的「造詞」一般，將字放在具體語言環境中，亦有助於兒童的語言上

中國語文教育百年以來，在歷經種種變化以後，傳統集中識字系統或現代分散識字系統孰優孰劣，很難說個明白，蒙學《識字卡》與《識字教授書》正是語文教學蛻變歷程中的過渡性產物，雖然不一定適用，但代表當年的種種嘗試，爾後，新文化運動興起，白話文教科書漸漸成形，而教科書編審及出版也隨著時代的劇變而逐漸邁向新頁。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1. 參見劉占泉，〈漢語識字教學古今流變簡說〉，頁70。文載《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總第115期。
2. 本帙雖名為「書」，但《學部編譯圖書局備覽》之〈編譯已成書目表〉一：冊數欄列為47包，故疑其形式極可能為識字卡。
3. 宣統元年（1909），學部鑑於各地辦學困難，特頒〈簡易識字學塾章程〉，提供失學民衆學習中國文字，編譯圖書局於是又編印好幾種不同的識字教材，專供「簡易識字學塾」使用。
4. 參見余國江，〈傳統識字教學的優點及其對外漢字教學的啓示〉，文載《教育與職業》2007年3月下第9期（總541期），頁120-122。